



论翻译文本之外的文化操纵——以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三个中译本为例

谭敏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

二十世纪末译学研究发生“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操纵学派”应运而生。该学派的先驱勒菲弗尔和苏珊·巴斯奈特指出，翻译是对源文的改写，而所有的改写都是特定社会中的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以某种方式对原文的操纵。文化对翻译的操纵主要表现在译文内和译文外操纵两种形式，且两者都影响源文在译语文化中的形象和意义，但从宏观上对源文意义的控制来说，后者的影响力度更大，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操纵程度也更深刻。本文以王尔德的代表作之一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为例，选取余光中、张南峰、钱之德三人译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译本，主要从译文外的层面分析两岸三地不同的译入语文化对文学翻译的操纵。研究发现译入语文化系统中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和诗学对文学译本的强烈影响，透过译文外的操纵，即在翻译选材、前言后记、注释、文学评论和发行等方面的控制，更能决定该译本在译入语文学、文化系统中的价值，操纵程度更加深刻。文章也指出要避免意识形态和诗学操纵的绝对化，而是将其视作翻译研究中的一个新视角，改变“原著中心论”的老路，从语言对比研究转向翻译文化研究，并在研究时把译文内和译文外两个层面的文化操纵合理结合，才能为全面深入认识文学翻译和译入语文化关系打下扎实基础。